

不得不亲操炊务；有病住进北大医院，也要“早请示晚汇报”，一次，我和家父在公共汽车上碰上竺伯伯，他告诉爸爸为浙大之事，他接受了上百批次的外调来访。他在《竺可桢日记》中愤愤说：“这样对待高级知识分子，实在过分了。”他曾掌领的浙大，“旧时人员 300 多都集中在六和塔（分校）学习数月”。前校长痛苦地写道：“有许多是要打倒的。”教育家郑晓沧“告老”不准；孟宪承死后家属被逼迁居，交出存款；苏步青被罚跪；谈家桢妻自杀；谷超豪——前浙大引以为豪的学生——却成了复旦开辟专搞科学而不以政治挂帅的“谷超豪道路”的“白专”典型；常书鸿，以日记得祸，“把他脊骨敲断”……

科学院各研究所的人，施雅风、刘东生、潘菽、童弟周、曾呈奎、张玺、蔡邦华、刘崇乐、柳大纲、曹天钦、赵忠尧、钱人元、陶愉生、熊庆来、杨钟键、裴文中、黄汲清、钱三强、何泽慧、赵九章以及叶君健、吴世昌等等，他们的遭遇都记在竺可桢哀痛的笔下。

在科学受到糟践的年代，竺可桢黯然神伤。他没有被打倒，却是一个“被审查对象”。他是副院长，早已失去了过问科研决策的权力和亲自考察的机会。竺可桢曾为“科学家”这个神圣的称谓立下三种操守和尺度——虚怀若谷，不武断蛮横，不凭主观，不抱成见；实事求是，专心一致，不作无病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不盲从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如遇逆境，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他不愧“科学家”这个称号的。一向主张学术独立、教育独立的竺可桢曾竭尽全力排除政治的干扰，维护学术和教育的尊严。在现代中国的急风骤雨中，他以自己的人格、理想和才干为浙大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学术、教育氛围，吸引了许多一流学者、教授。在浙大的发展历程中，从 1936 年到 1949 年担任校长长达 13 年之久的竺可桢先生可谓居功至伟，被公认为浙大学术事业的奠基人、浙大“求是”精神的典范、浙大的灵魂。

中国生物学的一代宗师秉志先生

家父生前常讲起生物学界的几位前辈，其中一位是动物学家秉志，他是

战时期，全册共四篇——居家、求学、处世、报国。

在《居家》篇中，秉志写道：“吾家以勤俭为教。我年幼时，吾父母即以是教育吾兄弟辈。今吾亦愿汝遵循家风。对饮食衣服，只求足以卫生，而不可过于讲究。”“与之谈话及嘱其做事，宜于语言之间，带裹恭和厚之气，凡待人以厚者，皆是自求多福之道。青年人尤宜注意此节。”曾几何时，传统文化被摒弃，没有传统文化的熏陶，结果使得年轻人不仅难以有所作为，而且迷失了方向。作为一位科学大家，秉志虽出身世家，且属社会上层人士，但成就其一生事业之本却是他的人格魅力，是他宽厚的胸怀和平和的心态。

在《求学》篇中，秉志写道：“近日国内青年之求学，有两种倾向。一为功利之见过甚；二为浮躁之气过强。此二者皆为不良趋势也。”“天下最有价值之物，即是学问，势位与金钱不足与学问比拟。吾今已五十余岁，觉学问为最有味之物，日夜求之而不厌。”写得多么好啊！联想当今社会功利主义盛行，不少人追求金钱不择手段，学术界浮躁之气岂止过强，学术腐败致使神圣的科学殿堂遭受玷污，让人由衷地钦佩秉志先生高尚的道德品格与严格的治学育人的科学精神，以及像他一样的中国老一辈科学家。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先生于1933年所言，更为贴切：

如果中国有科学家，立身行己，处事接物，表现出真正科学精神，足以引起社会的景仰与效法，他的影响是很大而很好的。中国科学兴起甚晚，这样的人物当然还不容易产生，但是我们也并不是没有很可佩的人。例如秉志先生，不但是生物学著作等身，而且二十年来忠于事业，从不外骛。学校散了，没有薪水，他一样的努力工作；经费多了，他也是这样的努力工作。标本所得，他便尽力研究，研究有所获，他从速发表。他的工作只求一点一滴的进益，并不追求铺张扬厉的虚声。这都是真正科学家的态度。他对于后起的学者，不但尽心指导，而且尽力的拿好的材料给他做，甚至分自己的薪水帮助他。因为有他这样的人格，所以养成中国许多动物学家，莫不仰为宗匠。